

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

清詞序跋彙編
(第一冊)

馮乾 編校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

清詞序跋彙編
(第一冊)

馮乾
編校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清詞序跋彙編 / 馮乾編校. -- 南京 : 鳳凰出版社,
2013. 12
ISBN 978-7-5506-1929-6

I. ①清… II. ①馮… III. ①詞（文學）—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294647號

| | |
|-------|---|
| 書名 | 清詞序跋彙編 |
| 編校 | 馮乾 |
| 責任編輯 | 林日波 王愛榮 |
| 出版發行 |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 發行部電話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郵編:210009 |
| 出版社網址 | http://www.fhcs.com |
| 經銷 |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照排 |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|
| 印刷 |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,郵編:211523 |
| 開本 | 960×1304毫米 1/32 |
| 印張 | 76 |
| 字數 | 1907千字 |
| 版次 |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978-7-5506-1929-6 |
| 定價 | 350.00圓(全四冊) 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-57572508) |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·
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
國家“985 工程”三期經費資助

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

總序

程章燦

古典文獻是傳統文化的載體，研究傳統文化，不能不從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做起。另一方面，對古典文獻進行整理、闡釋與研究，不僅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，同時也是繼往開來、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重要一環。衆所周知，中國歷史悠久，古典文獻汗牛充棟，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；而如何通過對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，表達當代人的學術趣味和文化關懷，體現當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學術水準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是相當艱巨的。這是一項偉大而繁複的事業，可以分解成無數項具體的工作，需要很多同仁的投入與協作；同時也是一項細水長流的事業，每一位傳統文化研究者都責無旁貸，儘管各人所能貢獻的也許祇是涓滴之水。實際上，如果打一個比方，文獻傳承就好比一條河流，那個表面上似乎看不見摸不着的文化傳統，正如粼粼波光，蕩漾於寬闊的河面之上。這條河流蜿蜒曲折，在流淌過程中不斷接納來自山澗的溪流，吸收來自天上的雨水，也慷慨地奉獻，灌溉着其所流經的廣袤的中華大地。今天，這條河已經流到我們面前，我們怎麼能不對它有所貢獻呢？

有鑒於此，二〇〇八年，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同仁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“文獻傳承與文化認同研究”叢書。在那一套叢書的總序中，我曾經強調文獻傳承對於傳統延續、文化建設以及文

化認同的形成的的重要性。我在序言的最後，表達了這樣一個態度：“也許我們做得不夠好，但是，我們一直在努力。”現在呈現在各位面前的這一套“古典文獻新視野”叢書，就是我們繼續努力的表現。前一套叢書的標目，強調文獻傳承研究對於文化建設的現實意義，而這一套叢書的標目，則強調以新的視野來整理與研究古典文獻。從表面上看，兩套研究叢書似乎頗有不同，實質上却是相輔相成，後先承續的。

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，歷代成果積累之豐厚、傳統學術方法之完善，都使人們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感覺：這樣一門學科很難再有新的領域開拓和學術創新了。從某一個角度來看，這種感覺似乎有一定道理，因為我們畢竟處於一個與前人不同的時代，我們既沒有從小接受過古人那樣的蒙學教育，也沒有像前輩大家那樣深厚的小學基礎，甚至也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皓首窮經，聚精會神，窮畢生之力專治一經。作為當代人，我們不得不分出若干精力，學習其他知識，掌握其他技能，以應付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之必需。但是，我們畢竟擁有某些古人所沒有的優勢，例如在文獻資源的占有和使用方面，我們便有着較古人方便優渥的條件。當代公私圖書館整理並開放自己的典藏，雖然並不完全理想，畢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；新時期以來，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；這些都是古人難以想象的。至於近年來，隨着方興未艾的電子技術和無所不在的網絡技術的發展，衆多體量龐大而且以前堪稱稀見的古典文獻，紛紛化身為便攜易檢的電子數據，成為幾乎隨時隨地都唾手可得的資源，這種景象非但古人無法想象，即使前推半個世紀，恐怕也沒有學者能夠想到。總之，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，無論是影印出版還是整理出版，紛至沓來的文獻資源，為今天的研究者打開了一扇更開闊的窗口。文獻資源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，也使當今研究者擁有了文獻資源的新視野。

這裏所講的文獻資源，實際上已包含前人在古典文獻整理研究

方面所取得的成果。這些學術積累不僅是我們整理研究和消化吸收的物件，而且也為我們的研究奠定了學術的基礎，使我們可能擁有更開闊的視野。套用那句老話來說，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，就有可能比古人站得更高，看得更遠。我們不僅可以上下流連，還可以“左顧右盼”，“東張西望”，吸收國內外相鄰學科在文獻整理研究上的經驗和方法，提升研究的學術境界。掌握更全面完備的資源，輔以新的研究方法與理念，就有可能使我們的立足點更為高遠。在這樣的學術基點之上，即使處理古典文獻中的基本典籍和基本問題，也有可能採取與傳統學術不盡相同的方法，得出不同的結論，取得全新的成果。換句話說，視角的更新與多樣化，也就可能帶來視野的更新與多樣化。以往未曾受到關注、未曾受到重視的古典文獻，就有可能因此進入我們的視野，生僻可以變為熟悉，冷門可以變成熱門，伴隨着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的風雲際遇，古典文獻學術史也將展現新的景觀。

運用包括現代電子技術在內的各種研究手段，不斷開拓可供利用的文獻資源，是當代古典文獻研究者的職責。在這一方面，除了重視對傳世文獻的發掘和整理，強調對新出土文獻的整理和利用之外，還應該加大對既有文獻總體再加工的工作強度，生產出更多、更具學術價值的新學術文獻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志在建設一座古典文獻的宏偉大廈，那麼，除了發掘並整理傳統文獻和出土文獻，使用那些現成的建築材料，還應該自己動手，設計、發明和生產更方便、更安全、更堅固耐用的建築材料。要之，古典文獻不僅是供我們整理和研究的，也是需要我們生產、積累並重構的，祇有這樣，這一資源才會日益豐富，而不至於陳舊、匱乏。

顯而易見，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是分不開的，輯佚學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。輯佚學中既有整理，又有研究，是一門很能體現中國古典文獻學特色的學問：利用既有的古典文獻資源，努力恢復已經佚失的古代典籍，重建古典文獻彼此之間已經失落的某些聯繫，

進行這些工作的學者，有如施展回春妙手的醫生，使亡書佚籍“無中生有”，甚或“起死回生”。在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整理，根據重新建構的新文獻，展開新一輪的研究，學術疆域便可能如漣漪般向外擴展。在這裏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，中國古典文獻是一個縱橫雙向開放、不斷變化、日益豐富的系統，而且應該看到，中國古典文獻還是一個環環相生、彼此聯繫的系統。乾嘉學人熱衷於輯佚之學者不乏其人，其旨趣絕不止於個別典籍，而是更着眼於其背後的那個宏大的古典文獻系統，志存高遠。在現當代學術界頗為流行的各種輯編彙纂，在某種意義上，就可以說是從輯佚學中發展起來的，雖然二者的方法與結果有所不同，但是在“無中生有”的思路，却堪稱殊途同歸。當然，這些輯佚或者輯編彙纂涉及諸多學科，規模不同，大小各異，類型繁多，形式多樣，其方法亦因研究對象的不同而作相應調適。至於其對象的選擇，則往往取決於學者的立場與旨趣。在這裏，新視野主要體現在整理和研究的方式上，這種方式不僅體現了現代學術的旨趣，也在方法和視角上體現了現代學術方法的進步。

上文主要是就資源、視角、方法和動機這幾個方面而言，嚴格說來，古典文獻研究的新視野，絕不祇限於這些。這一套叢書中所包含的諸書，各有側重，各有特色，將會證明這一點。就像它的研究對象一樣，我們希望，這一套叢書也能成爲一個開放的系統，祇有更多的人、更多的研究成果參預進來，古典文獻及其研究才能與古爲新，生機勃勃。

是爲序。

前 言

詞籍序跋是研究詞史、詞學理論與詞學批評的重要文獻，具有很高的史料和理論價值。隨着詞的流行和詞集的編纂，遂產生了詞籍序跋。

詞起源於唐代，至晚唐已經極為流行，因之也出現了詞的編集。歐陽炯《花間集序》中云：“近代溫飛卿復有《金荃集》。”所言的溫庭筠《金荃集》當為詞籍，但未言其卷帙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溫庭筠《金荃集》十卷，不知是否為詞集。已知最早的詞集當為敦煌寫本《雲謠集雜曲子》，收錄詞作三十首，多為民間詞人所作。學者考訂詞卷寫成時間不晚於後唐末期，其編集應當更早。略晚於《雲謠集》的是《花間集》，這是一部晚唐五代詞的總集，後蜀趙崇祚編，成於後蜀廣政三年(940)。收錄溫庭筠、皇甫松、韋莊、薛昭蘊、牛嶠、張泌、毛文錫、牛希濟、歐陽炯、和凝、顧夔、孫光憲、魏承斑、鹿虔扈、閻選、尹鶚、毛熙震、李珣等十八位詞人所撰詞五百首。《金荃集》和《雲謠集》編集時有没有序跋，今已不得而知。現存最早的詞籍序跋是歐陽炯《花間集序》，序中論及詞的起源、詞的特質，以及《花間集》編纂的情況，是研究唐五代詞的重要文獻。

宋代是詞創作的高峰，出現了大量詞集，與此相應，詞集序跋也大量出現。這些序跋不僅是宋詞繁榮的體現，而且反映了宋人的詞學觀念和宋代詞籍編纂的情況。尤其是關於詞的體裁特徵、詞的音律、風格、填詞技法等，在其中均有所涉及，並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觀點。金元詞作衰落，詞籍序跋也不多。明代詞的創作雖不發達，但詞籍刊刻盛行，詞籍的序跋題記等數量眾多。由於很多出於詞籍刊刻者之手，故對詞籍的編集、版本情況多有考訂，具有較高的文獻學

價值。

清代詞學中興，詞人蔚起，創作了大量的詞作。由已出版的《全清詞》“順康卷”、“雍乾卷”看，其篇幅已遠逾《全宋詞》。清代詞籍刊刻數量龐大，僅林玫儀《清代詞集知見錄》所載清代詞集已達六千餘種。與此相應，詞籍序跋題記的數量遠遠超出前代的總和。然而，儘管清代有數量龐大、內容豐富的詞籍序跋，但對其研究和使用的很不充分。這和清代詞學文獻的特點及其編纂現狀有很大的關係。一方面，清代詞話發達，詞話或輯錄前代詞學文獻，或為作者自撰。通常認為，一部詞話比單篇詞籍序跋內容更豐富，闡析更深透，更成體系。詞話的編纂成果斐然，已有《詞話叢編》（唐圭璋編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）、《詞話叢編續編》（朱崇才編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）等集成類著作，這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而詞籍序跋多附詞集刊行，有的收在文集或書目中，極為分散，輯錄整理很不容易。目前已經出版的詞籍序跋彙編有兩種：一是《唐宋詞籍序跋彙編》（金啓華等編，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），收輯唐宋詞籍序跋；一是《詞籍序跋萃編》（施蟄存主編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），此書第七卷專收“清人別集序跋”一百篇左右，卷九、卷十中收清詞總集、選集序跋數十篇。相對全部清代詞集序跋而言，這個數量是極少的。並且，由於特殊原因，《詞籍序跋萃編》所收序跋出處僅署書名，未標明版本，很難核對原書，故不便使用。雖然清代詞集數量眾多，但除極少數名家詞集外，大部分詞集缺乏整理；而《全清詞》則限於體例不收序跋。故而對於清詞序跋的編纂整理相當有限。以上原因，造成詞學界對清代詞籍序跋材料的研究和使用相對不足，清詞序跋的史料價值和文藝理論價值尚有待挖掘。

清詞序跋數量龐大，其功能主要包括：（一）反映詞人生平、詞人和詞人群體的詞學活動；（二）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資料；（三）反映詞集編纂、刊刻、流傳的情況。茲略作介紹：

一 清代詞人的生平、詞人和詞人群體的詞學活動

清代有的詞人生平傳記資料不詳，詞籍序跋中保存了一些信息，可資考論。如譚獻稱爲“倚聲家老杜”的咸同間詞人蔣春霖，其《水雲樓詞》及《水雲樓詞續稿》前有徐燾、何咏、李肇增、褚榮槐、宗源瀚序及周念永、謝鼎熔、金武祥跋。這些序跋作者或爲蔣氏生前之友人，或爲其鄉後進私淑者，所收各序或評其詞，或記其人，或論其世，爲研究蔣春霖及其詞提供了寶貴的資料。又如吳中詞人宋志沂，天分很高，不幸死於太平天國兵亂，所撰詩文皆散佚。其遺著《宋浣花詩詞遺稿》爲友朋哀集，其中收錄了同仁所撰的詩詞序跋及時人志哀的詩詞，起到了知人論世的作用。另外，有一些清代詞籍，由於種種原因現已失傳了，而其序跋仍保存於詩文別集中，這些序跋也有存人之功。

清詞序跋有許多是作者的自序或作者同時人所撰，其中保存了很多關於詞人及詞人群體詞學活動的材料，是建構清詞史的重要文獻。

例如清初詞壇著名的秋水軒唱和，嚴迪昌《清詞史》認爲“是‘輦下諸公’發揮影響力的一場社集性質的群體酬唱活動，也是‘稼軒風’從京師推向南北詞壇的一場大波瀾”。秋水軒倡和緣起見曹爾堪撰《秋水軒倡和詞紀略》：

周子雪客(周在浚)至京師，僑居於孫少宰之秋水軒。軒在正陽門之西，背城臨河，葭蘆秀其陰，當夏雨暴漲，水痕嚙岸，捲簾凭几而觀之，不啻秋水一壑，心骨俱清，此亦都市中之濠濮也。雨後晚涼，停鞭小坐。見壁間酬唱之詩，雲霞蒸蔚。偶賦《賀新涼》一闕，廁名其旁。大宗伯公(龔鼎孳)携尊餞客，見而

稱之，即席和韻。既而露垂泉湧，疊奏新篇，可謂濯綺筆於錦江，吐繡腸於沙籀者矣。槩子（紀映鍾）、方虎（徐倬）同授餐於宗伯，亦擊鉢而賡焉。均工組練，並擅賦心。

可知秋水軒是周在浚在京師的寓所，曹爾堪作《賀新涼》原唱，而京師文壇領袖龔鼎孳和之，而後影響擴大，衆多詞人參與唱和。汪懋麟《秋水軒倡和詞序》曰：

（秋水軒倡和）始於南溪學士（曹爾堪），而廣於合肥宗伯（龔鼎孳）。縱橫排宕，若瑜、亮用兵，旗鼓相敵。一時名流，相與爭奇奪險，愈出愈工。如槩子（紀映鍾）、方虎（徐倬）、伯通（龔士稚）、雪客（周在浚）、古直（王彥來）、緯雲（陳維岳）、湘草（杜首昌）諸君，俱各揮灑流暢，妙極自然，無復押韻險澀之迹。而西樵考功（王士禛）最後成六闕，以爲之殿，溫雅典贍，洋洋若《關雎》之亂矣。予塵垢滿胸，諸君屢索和，不成一字，固鞭策之不前，亦見敵而遁之善計耳。詞非一題，成非一境，統冠之以秋水軒者，大都登壇樹幟，鼓諸軍之氣，而卒以奏成功者，雪客之力爲多也。

二文對秋水軒唱和之緣起及倡和的具體情況作了生動的介紹，使後人對清詞史上的這件大事有所認識，並由此探討其背後的詞人心態和時代心理。

而清初詞壇另一重鎮在揚州。康熙初年，揚州詞壇發生過兩次重大的唱和活動。一是由王士禛組織的紅橋唱和。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王士禛任揚州推官，於康熙元年（1662）與揚州地區本地及流寓的士人舉行紅橋唱和，並且編選、評點、刊刻詞集，對清詞復興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。二是康熙五年（1666）的廣陵唱和，儘管規模不如紅橋唱和，但參與的詞人心態更爲複雜，寓含的詞史意義更大。

孫金礪《廣陵倡和詞序》中有詳細記載：

廣陵紅橋之集，得四十六人，可謂盛矣。已而之遠者，還故鄉者，往京畿者，次第散去。四方之客，殫留於此，止予與荔裳觀察（宋琬）、顧庵學士（曹爾堪）、西樵司勳（王士禛）、長益（談允謙）、其年（陳維崧）、雲田（李以篤）、方艱（沈泌）八人而已。惟定九（宗元鼎）為土著，巢民（冒襄）、散木（陳世祥）、孝威（鄧漢儀）、汝受（范國祿）、希韓（季公琦）屬廣陵州縣者也，豹人（孫枝蔚）、穆倩（程邃）、舟次（汪楫）則僑家廣陵者也。猶得十七人，詩酒燕聚，交歡浹月。初集時分賦五言近體，復限“屋”字韻賦《念奴嬌》詞。嗣是，諸子踵華增美，倡予和汝，迭相酬贈，多至十餘首，少者七八首。抽新領異，各出心裁，涵今茹古，覺前人《花間》、《草堂》之席，已奪螯弧而登。

序中論及廣陵唱和的緣起，列舉參加唱和的人員、唱和詞牌及所用韻部，對廣陵唱和在明清之際詞風轉變中的作用也有論及。

對於清代詞史的建構，清詞序跋也有巨大的文獻價值。如對常州詞派，學界已有相當研究，建構了從張惠言到周濟、譚獻、陳廷焯一綫相延的詞統。同時，對於常州詞派對晚清詞學的影響，也有共識。但在清詞序跋中，仍有一些值得重視的材料，可以推進既有研究，展現清代詞學發展的細節。如乾嘉間從張惠言學詞者除金式玉、董士錫外，還有蔣學沂。蔣學沂，字小松，江蘇陽湖人。蔣學沂《藕船詞自序》云：

余嘗受填詞法於編修張先生。先生之言曰：“詞者，詩之餘也。詞學始於唐季六朝，至南北宋為極盛。後人為之，或流於放，或傷於纖巧。故元明以下無詞，國朝乾隆間始有人起而振

之。”則先生自謂也。先生又曰：“為蘇辛者易粗，學秦柳者傷雅。今之詞人，皆市儈酗酒，槎旦登場也。夫以清廟明堂之奏，而雜以俳優諧蕩之音，間以灌夫叫嘯之氣，其可乎哉？夫有句無章，其弊也鄙。甚或美人芳草，明月斜陽，識二三百字，便成詞家，宜才子之多也。古之人境遇之抑塞，憂思所鬱紆，用筆命意，歸之至約，而出之幽惻，怨而不亂，哀而不傷，庶幾詩人忠厚之旨乎？”余服膺先生之訓，為之有年。

序中引述張惠言論詞的觀點可以和張氏《詞選序》參看，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。從張琦學詞者則有王曦（有《鹿門詞》）、吳廷鈺（有《塔影樓詞》）等。張琦之子張曜孫撰《塔影樓詞跋》曰：“道光甲申，先子官山左，偉卿依居二年，與王子季旭同受詞於先子，此卷即先子所點定者。”可以考見張琦對常州詞學的貢獻。張曜孫編選受常州詞風影響的詞人詞集為《同聲集》，擴大了常州詞派的影響。所自撰《昇甫詞》三卷，惜未刊刻，然稿本尚存。稿本上有道咸間著名學者包世臣、劉毓崧、洪麟孫、董毅、謝元淮、李兆洛等人的題跋，對張氏詞作多所評價，從中也反映了詞人交游的情況。

二 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

清代許多重要的詞人，本身未撰作詞話，其詞學思想往往通過詞籍序跋體現出來。如雲間詞派的陳子龍，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、厲鶚，常州詞派張惠言，吳中詞派戈載等。

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，他所揭櫫的浙西詞派宗旨即通過詞籍序跋的形式來發布。浙西詞派詞宗南宋，《孟彥林詞序》曰：

宋以詞名家者，浙東西為多。錢唐之周邦彥、孫惟信、張炎、仇遠，秀州之呂渭老，吳興之張先，此浙西之最著者也。三

衢之毛滂，天台之左譽，永嘉之盧祖皋，東陽之黃機，四明之吳文英、陳允平，皆以詞名浙東。而越州才尤盛，陸游、高觀國、尹煥倚聲於前，王沂孫輩繼和於後。今所傳《樂府補題》，大都越人製作也。

文中歷數南宋詞人，正是要建立浙西詞派的統系。在南宋詞人中，朱彝尊又特尊姜夔，可見其瓣香所在。《黑蝶齋詞序》曰：

詞莫善於姜夔，宗之者張輯、盧祖皋、史達祖、吳文英、蔣捷、王沂孫、張炎、周密、陳允平、張翥、楊基，皆具夔之一體。

由此，朱彝尊在《魚計莊詞序》中提出“小令宜師北宋，慢詞宜師南宋”的觀點，並在其它詞序中屢屢提及，如《洪崖詞序》曰：“竊思晚唐、北宋，惟小令爲工。若慢詞，至南宋而始極其變，體乃大備。”《水村琴趣》曰：“小令當法汴京以前，慢詞則取諸南渡。”

而浙西詞派的另一位大家厲鶚的詞學觀點也是在其詞集序闡發的。他的詞論核心一是在《群雅詞集序》中所主張的“雅”，曰：

詞源於樂府，樂府源於詩。四《詩》大、小雅之材，合而有五。材之雅者，風之所由美，頌之所由成。由詩而樂府而詞，必企夫雅之一言，而可以卓然自命爲作者，故曾端伯選詞名《樂府雅詞》。周公謹善爲詞，題其堂曰志雅。詞之爲體，委曲擘緩，非緯之以雅，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。

二是推尊南宗，《張今涪紅螺詞序》曰：“嘗以詞譬之畫：畫家以南宗勝北宗。稼軒、後村諸人，詞之北宗也；清真、白石諸人，詞之南宗也。”這與朱彝尊之觀點恰相印證，反映了浙西詞派在詞學思想上的傳承。

與浙西詞派相繼而起的常州詞派，其開山領袖為張惠言。張惠言的詞學思想集中體現在《詞選序》中，該序是常州詞派的綱領，奠定了常州詞派的宗旨，以及尊體的觀念以及比興寄托說詞的闡釋方法。

吳中詞派則以嚴於詞律著稱。戈載作《詞林正韻》，對填詞用韻加以規範。其《翠薇雅詞自序》引顧廣圻語：“詞之所以為詞者，以有律也。詞之有律，與人之有五官無異。五官之位次，一定不易。若移目為口，置耳於鼻，鮮不駭為怪物者。詞之於律亦然。人必五官端正，而後論妍媸；詞必四聲和協，而後論工拙，否則長短句之詩耳，何云詞哉？”可見吳中詞派在詞律上的講求。

詞學批評是清詞序跋的一個重要功能。今以納蘭成德詞為例略作說明。納蘭詞在清詞中具有獨特的情感內容和美學特質。清詞序跋對納蘭詞有較多的批評。譚獻《復堂詞話》曰：“有明以來，詞家斷推湘真第一，飲水次之。”又與蔣春霖、項廷紀並稱詞人之詞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中對納蘭詞位置更高，曰：“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”王國維《人間詞》前有王氏托名樊志厚的序，通論詞史，眼界極高。其論曰：

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淺也。珠玉所以遜六一，小山所以愧淮海者，意境異也。美成晚出，始以辭采擅長，然終不失為北宋人之詞者，有意境也。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，唯一稼軒，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。白石之詞，氣體雅健耳，至於意境，則去北宋人遠甚。及夢窗、玉田出，並不求諸氣體，而惟文字之是務，於是詞之道熄矣。自元迄明，益以不振。至於國朝，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，崛起於方興之族。其所為詞，悲涼頑艷，獨有得於意境之深，可謂豪傑之士，奮乎百世之下者

矣。同時朱、陳，既非勁敵；後世項、蔣，尤難鼎足。至乾嘉以降，審乎體格音律之間者愈微，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。豈非拘泥文字，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？

其中對納蘭詞的批評正是對《詞話》中“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”的注腳。譚獻和王國維對於納蘭詞在詞史地位的確立，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而從清詞序跋中對納蘭詞的批評來看，正可以看出納蘭詞的特色及其在清代詞史上地位的變化。

納蘭成德詞最早的版本為康熙十五年(1676)左右編成的《側帽詞》，此本已佚。其後是顧貞觀於康熙十八年(1679)刻成的《飲水詞》，此本亦佚，但吳綺和顧貞觀所製序則保存了下來。吳序以駢體寫成，中曰：“成子姿本神仙，雖無妨於富貴；而身游廊廟，恒自托於江湖。故語必超超，言皆奕奕。”對納蘭成德的性情有所涉及。顧序則更為具體，曰：“非文人不能多情，非才子不能善怨。騷雅之作，怨而能善，惟其情之所鍾為獨多也。容若天資超逸，倏然塵外。所為樂府小令，婉麗清凄，使讀者哀樂不知所主，如聽中宵梵唄，先凄惋，而後喜悅，定其前身，此豈尋常文人所得者。”指出納蘭詞多情善怨、婉麗清凄的特點，均能得納蘭詞的真際。但二人對納蘭詞的地位均未作評價。

稍後孫默、聶先《國朝名家詩餘》選《飲水詞》一卷，丁澎和聶先均有評語。丁評謂其詞如“名葩美錦，鬱然而新，又如太液波澄，明星皎潔”，以意象評詞，略嫌空泛。而聶先評其詞“香艷中更覺清新，婉麗處又極俊逸，真所謂筆花四照，一字動移不得者也”，略得納蘭詞的大體。

可見，在康熙年間，儘管納蘭詞已有一定的影響，但其在詞史上的地位並未確立。納蘭成德在詞林地位的奠定要到嘉慶年間。

嘉慶間，楊芳燦手鈔納蘭詞，並製序，序中曰：